

[摘编]初步建立中国语言学史的学科理论

薄守生

(郑州大学文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 本文摘编自《关于中国语言学史学科理论的一点思考——兼及从人们对文化史研究的反思中得到的启发》一文, 该文原发表于《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年第2期。

关键词: 中国语言学史 学科理论 初步建立 学科总结与反思

中图分类号: H009 **文献标识码:** A

中国语言学史的学科建设值得重视。关于“中国语言学史”学科的相关理论及学科发展, 其实就是“中国语言学”的“史学史”, “中国语言学史”可以看作是中国史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人们通常认为“史学史”是“文化史”的一个分支学科, 但是, 对于“文化史”的内容范围人们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语言学史”是“文化史”的组成部分, 虽然以往的文化史著作中很少有关于语言学史的内容。在此, 我们主要探讨中国语言学史的学科建设, 其中包括“文化史研究对中国语言学史研究的启发”方面的内容, 但重点不在于探索语言学史和文化史二者之间的关系。

一、文化史和语言学史研究的特点很不相同

通常, 文化史研究可以相当泛化, 甚至可以异常空灵, 人们却很少去批评那样的文化史研究漫无边际、太过虚空。然而, 中国语言学史的书写却从未流畅过, 总是显得磕磕绊绊、不忍卒读。以往, 人们把文化史和语言学(史)关联起来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一些涉及微观层面的研究, 例如: 从词语的语源和变迁看古代文化的遗迹, 从称谓名词看婚姻制度, 典章制度用语的训诂学研究。这些类型的微观研究其实还是罗常培《语言与文化》的研究传统, 这种研究传统中所涉及的语言学基本上属于语言学的分支学科“社会语言学”的范畴(我们不用“文化语言学”称呼, 在此也不讨论“文化语言学”与“社会语言学”的异同)。因此, 文化史主要是和“‘社会语言学’(史)”相关联, 并非与“语言学(史)”全面关联。

从微观层面来看, 文化史和语言学史二者之间并非泾渭分明。在讨论一篇学术论文不属于语言学论文时, 我们有时并不太容易把握, “从文字考证, 到词语考释, 到典章制度考证, 到思想文化考证, 似乎都与考证有关系, 但是它们从微观到宏观、由实到虚过渡的程度并不相同。文字考证、词语考释可以归属语言学, 而制度、思想、文化考证就不宜归入语言学的范畴了”(薄守生、赖慧玲《百年中国语言学思想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年版, 第80页)。在谈“语言学的分支学科包含社会语言学”时, 我们常常不会刻意强调其历史的因素。那些涉及“制度、思想、文化”的语言要素(字、词、短语、句子), 很多都可以认为是“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对象, 不管它们这些要素处于一种共时的层面还是历时的层面。因此可以认为, 凡是对这些“语言要素”进行微观考证的研究, 基本上都可以归入“‘社会语言学’(史)”研究的范围。

二、语言学史之不可绝对断代

“语言学史”与“语言史”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语言史”可以大体上断代, “语言学史”却无法绝对断代。语言史断代一般都可以做到比较客观, 这一类的研究结论是有可能真实的, 其中有一些甚至可能会是历史事实。

语言学史无法绝对断代，这既涉及语言学思想的断代困难的问题，又涉及语言研究源流（研究对象、研究材料）可能溯及很远的问题。比如说，民国时期的人们对《说文解字》有研究，那么，研究“民国语言学史”的人要不要重新从研究许慎的《说文解字》开始呢？民国时期的人们在研究《说文解字》的时候，他们可能参考了宋代人对《说文解字》的研究，也可能参考了清代人对《说文解字》的研究，那么，研究“民国语言学史”要一定首先研究清楚宋代语言学史、清代语言学史吗？如果一定要研究清楚，那么，是不是可以说：语言学史前代可以断代，后代只能包举前代一起断代，到了当代就只能研究整个语言学通史了呢？那样理解肯定有问题。当然，我们还可以把这种情况总结为：研究对象是“零基础”还是“层累地发展”的问题，当“一种语言学”是“零基础”的时候断代自然容易，当“一种语言学”是“层累地发展”的时候断代肯定困难。只是，“零基础”和“层累地发展”相对而称，二者不一定能够截然区别。

当“断代”无法绝对划分时，“断点”“漏点”的问题可能会突出起来。正是因为如此，对于任何一部语言学史著作来说，有所“遗漏”是正常的或者是真实的情况。所以，在绝大多数时候，评价语言学史研究不能以“遗漏”了多少人、“断点”了多少文为判断标准，而应该以代表性、完整性、清晰化、流畅程度为判断标准。可以说，断代、断点、漏点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对语言学史的评价问题，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不可谓不重要。

三、语言学史关注语言学理论的“成长史”

语言学史应该是语言学研究、语言学理论的“成长史”，而不能仅仅是“成年史”。语言学史贵在能够梳理语言学发展轨迹的流变过程，而不是堆砌几个语言学理论的断点就了事。我们在探寻语言学理论的“成长史”时，当然会格外关注语言学思想之“源”，探索单线性的“渊源”也许相对容易一些，并且，这种“探源”仅适用于该语言学思想的早期阶段。那些原本有“渊源”的语言学思想一旦被众多语言学家广泛地接受或批评，语言学家在借鉴或承袭这些语言学思想时往往会加入他们自己的思想，原有的语言学思想在流传的过程中也可能会出现某些脱、衍、串、误——语言学家参与者越众、流传越久，历史的“层累层积”就越复杂，我们就越难以描绘出语言学思想的清晰的“源流”关系。

在过去，语言学史著作往往侧重于各种“定型”的语言学理论的“罗列”，列举出了为数不少的已经“成年”了的语言学理论，却缺少语言学理论的“成长史”，这就隔断了语言学思想的内在的“流”。因此，语言学史的书写应该不怕细致，不怕细节，不怕细小。但是，细小琐碎却又是语言学史的大忌，碎片化、磕磕绊绊、不清晰、不流畅那都是语言学史力戒的弊端。

四、人们期待“专业化”的语言学“通史”

中国语言学史学科需要进一步“专业化”，这是破解语言学史“难”研究的路径之一。“学术史是最难‘研究’的，因为头绪纷繁，难以把握也难以深入。但同时学术史又是最易‘写’的，因为可以不读原著，据成说而敷衍成书。语言学史亦不例外”（傅杰、许万宏《中国语言学史研究的思考》，《文汇报》2001年7月6日第12版），只有深入“原始材料”的研究者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语言学史专家。如果语言学史不能做到“专业化”，人们要想深入“原始材料”就非常困难。

现在，林林总总的“汉语词汇学史”“汉语语法学史”“汉语音韵学史”等“语言学分支学科史”数量多、质量高，然而，“中国语言学通史”著作的数量相对较少、质量相对较低——类型众多的“部分”都已经相当成熟，中国语言学史的学科现状正是“部分大于整体”。在我国内，“所谓‘通史’包含两种意义，一是中国固有的‘通史’，即与‘断代史’相对的‘贯通古今’的‘通史’；另一种是中国与西方接触后输入的‘通史’，即与‘专史’相对的‘贯通政治、经济、学术、宗教等等’的‘通史’”（章清《“通史”与“专史”：民国史“写法”小议》，《近代史研究》2012年第1期）。在这里，我们把这种与“语言学分支学科史”相对的中国语言学的“整体史”称为“中国语言学通史”。

综上所述，就语言学史的学科发展来说，“中国语言学史”的学科建设（即关于“中国语言学史”的“史学史”）非常重要，亟需加强研究。惟其如此，中国语言学史才能实现真正的“‘史’‘论’结合”，人们才有可能写出一部“专业化”的中国语言学“通史”。

参考文献

- [1] 本文的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 [2] 薄守生、赖慧玲：《百年中国语言学思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 [3] 薄守生、赖慧玲：《关于语言学史和历史学科的关系的一点思考》，《新疆大学学报》2016 年第 5 期。
- [4] 薄守生、赖慧玲：《关于中国语言学史学科理论的一点思考》，《中南大学学报》2017 年第 2 期。
- [5] 薄守生：《关于语言学论著“文题相应”的一点思考》，《天中学刊》2017 年第 4 期。

作者简介：薄守生，郑州大学文学院教授。